時 評

觀察中共對解決「貧富差距」的誠意

Does China Really Want to Solve the Inequality Problem?

歐陽新宜(Ou-yang, Hsin-Yi)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一、中國大陸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人民日報 6 月 19 日引用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年 6 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在中國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為 0.465,超過國際公認的 0.4 的警戒線。報紙說: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問題十分嚴峻。廣東的《羊城晚報》報導,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最近發布的調查顯示,相對於城鄉收入差距,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同樣已成為一條「鴻溝」。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最高達 10.7 倍!報導援引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全國 54,000 多戶城鎮居民進行的調查顯示,2003 年占總體 20%的最高收入組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7,472 元;而占 20%的最低收入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 3,295 元,差距將近 6 倍。報導又說,統計顯示,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由 2002 年的 5.1:1 擴大到目前的 5.3:1,其中差距最明顯的是江蘇省,其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已高達 10.7 倍。

以上報導,被美洲僑報認為是「官方承認貧富差距擴大」。聽起來,中共已經開始正視此一問題的嚴重性,並且將開始「加大力度、著力解決」。無論站在什麼立場,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吾人當然樂觀其成。

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包括這次公布的,大陸的各項貧富差距指標仍在安全線之內。可是 2000 年來,中國學術界和傳媒普遍不相信官方的數字,甚至有像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這樣的研究機構,在全國範圍內作嚴格的抽樣,從入戶調查問卷的數據作出的計算,中國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係數都已經超過了遠比官方公布為大的 0.434,同時按城鄉家庭收入分組計算基尼係

第3卷第7期94年7月

數為 0.445,這些數據表明,中國大陸的貧富查距其實早已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 基尼係數正常的安全線。

為了比較上的方便,本文蒐羅了近年來各項關於中國大陸貧富差距報導的各種數據(表一)。在衡量世界各國「相對貧困」的貧富差距的狀況時,主要是以基尼系數與五等分指數作為代表。學術界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在 0.2 以下為高度均等,0.2~0.3 之間為相對均等,而 0.3~0.4 之間則處於相對合理範圍,超過 0.4 就表示差距偏大,貧富差距就處於警戒狀態,若達到 0.6 則屬社會動亂隨時發生的危險狀態。依據中國大陸官方數據來看,自 1995 年到 1999 年為止,大陸基尼系數的變化僅於 0.375-0.397 之間變動,表示其貧富差距問題仍處於合理的可接受範圍。但若從國際組織(世界銀行)與學術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數據觀察,則顯示早在 1994-1995 年間,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即已突破基尼系數 0.4 的國際警戒線(世界銀行—0.415、中國社會科學院—0.434),在 1999 年基尼系數更出現 0.457 的數據,這與大陸官方披露的數據(0.397)有很大的差別(表一)。

表一 中國大陸貧富差距狀況

				1 124/ 11-	- 1				
	城鎮基 尼系數	農村基尼系數	全國基 尼系數	國家統計 局城市社 會經濟調 查總隊	中國國 情國力	世界銀行	經濟 日報	大紀元 5/28 報導	熊海濱 2000 估計
1991 年	0.240	0.307	0.350			0.376			
1992 年	0.250	0.313	0.369						
1993 年	0.270	0.329	0.394						
1994 年	0.300	0.326	0.402				0.434		
1995 年	0.280	0.342	0.393		0.389	0.415			
1996 年	0.284	0.323	0.371		0.375				
1997 年	0.292	0.329	0.371		0.379				
1998 年	0.300	0.337	0.378		0.386	0.403	0.456		
1999 年	0.295	0.336	0.389		0.397		0.457		
2000 年	0.320	0.354	0.409				0.458		0.59
2001 年	0.330	0.390	0.447						
2002 年			0.468						
2003 年			0.465	五等級倍 數:5.2					
2004 年						五等級倍 數:10.7		0.561	

資料來源:中共統計局之社會經濟統計年鑑、世界銀行,經濟日報與社科院所出版之社會情勢發展與預測、聯合國人文發展報告辦公室,大紀元等。

2000 年以後,這個差距更大了。根據聯合國的數據,中國的五等分倍數高達 10.7,是全世界 177 個國家中的第 144 名。Gini index 是 44.7%,高於全球第 143 名 (表二)。和臺灣比較,大陸的人文社會經濟發展指數 (HDI) 低得多,但是貧富差距卻大得多。聯合國發布的這項資料,中共並沒有抗議,咸信其可信度要比中共在國內發布的數據可靠得多。

國家	HDI排名	五等分倍數	GINI 係數						
中國	94	10.7	44.7						
臺灣	27	6.3							
香港	24	9.7	43.4						
新加坡	25	9.7	42.5						
日本	9	3.4	24.9						
韓國	28	4.7	31.6						
美國	8	8.4	40.8						
俄國	57	10.5	45.6						

表二 社會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之國際比較(2004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辦公室http://hdr.undp.org/statistics/data/indic/indic_137_2_2.html, 根據世界銀行 2004 資料編成。

由此看來,無論官方還是非官方,無論承認還是不承認,對於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和加大的現象,似乎是沒有太大的爭議了。可是,這在以社會主義價值為標榜的中國大陸,是不對的,是矛盾的,是不能被一般民眾接受的。

二、中共官方的解決方案「求富」優於「救窮」

中共官方當然知道這個困境。2002年3月15日上午,在九屆人大五次會議 朱鎔基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在回答記者提問貧富差距時就說:

> 「關於中國的兩極分化或者說存在著貧富差距在加大的這種現象,我認為是存在的。我想你也大概記得鄧小平先生講過『讓一部分人 先富起來』,那麼必然有一部分人現在還沒有富起來。因此,貧富差距 的擴大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也許是不可避免的。

> 但是我們在執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政策的同時,在不斷地扶持低 收入群體或者說弱勢群體。比方說農民,提高農民的收入占了我的政府

第3卷第7期94年7月

工作報告的很大一部分,可以說成為我們的一個中心工作在加以推進。例如還對於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視,來扶持下崗的、失業的、離退休的職工,這都是我們工作的重點。除了我們政府通過財政預算來縮小這種貧富的差距以外,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稅收。我們通過稅收的政策、稅收的改革來扶持這一部分還沒有富起來的人民群眾。我相信,在一個時期以後,這種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最終會得到解決。」

從朱鎔基的話中可以知道,中共當前對貧富差距的態度是:先求富,再救窮。 求富是第一位的,救窮是第二位的。換句話說:發達國家資本是第一位的,節制 私人資本是第二位的。可是,當第二位的「救貧」與「節制」工作妨礙到第一位 的經濟發展時,第二位就必須讓位給第一位。中國大陸目前正是這個情況。

從中共對社會保障的態度與作法上就可以看出中共解決貧富差距的誠意。中 共的社會保障 1949 年以來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革。其間雖有社會主義與中國式 社會主義的爭論,但問題的本質卻仍然是一個財政負擔的問題。在社會福利的財 政支出方面包括了醫療、退休與失業三大部門;在社會福利的財政收入部分則包 括了個人、企業與國家三大塊。從社會保障支出的年度變化來看,從 1978 年到 1997 年間,其費用支出共增長 39 倍(1997 年總支出為 3,043 億元人民幣);其 中國有單位增長 37 倍、城鎮集體單位增長 37 倍、非公有企業增長 43 倍; 1997 年中國大陸財政支出為 9,234 億人民幣,其中社會保障支出卻只有 142 億元人民 幣,國家財政的社會保障支出,卻只增加7.5倍。以上保費單位結構的變化不僅 反映出:經濟越發展,非公有企業對社會保障的比重日增,政府在社會保障上的 支出日減。更為嚴重的是,占社會保障比例日增的非公營企業的社會保障覆蓋 率,在 1998 年卻只有 30%。相對於國營企業的 96%與集體企業的 53%,明顯的 是政府將負擔丟給企業,而企業卻又無力照顧的「棄民不顧」的非社會主義現象。 當政府的財政在 2001 年時已達 2,473 億元人民幣赤字的窘況下,中共一方面在 加入 WTO 後想要勵行國企改革、裁退冗員,以提升其競爭力;另一方面又要靠 政府的財政補貼來全面加大社會保障的覆蓋率,以維持此起彼落的社會抗議,這 無異是極為困難的事。1998年以後,中共開始將社會保障的財政劃分為「社會 帳 | 與「個人帳 |, 更對不同社會角色者產生了不同的社會效應,貧富差距因而 更行擴大。

三、「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攸關中共的社會主義合法性

難怪,中國社科院經濟學教授岳福斌分析說,中國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制度安排上的失誤。從制度上來看,中共只考慮經濟發展是第一位的,而把社會保障、社會平等放到第二位。這就難怪與經濟發展無關的社會保障、教育經費(中國大陸目前<4.5%;臺灣一度高達 15%),在全國經費總支出中比重如此之低了。面對這樣的困境,不僅社會保障開始採用「商品化」的社會帳,讓那些付得起保費的人才有社會保障的照顧;為了教育經費的籌措,也導致「教育產業化」、「有錢人才能讀得起好學校」的主張盛行一時,讓受教育者的機會不平等;在利潤的驅動下,教育產業領域良莠不齊,教育質量難以保證。高校大規模擴招帶來的高收費已經成爲貧困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去年 11 月間,中共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西安舉行的高教工作研討會上疾呼:「高校的收費不能再提高了,大學不能辦成『誰有錢誰就能上』的學校,這不是共產黨國家的教育」。識者可以再問一句:「社會保障辦成『誰有錢誰就能有保障』的政策,難道就是共產黨國家的社會制度了嗎?」如此看來,在市場經濟的榮景底下,社會主義平均主義的理想又在哪裡呢?